

一戰期間中國的 「以工代兵」參戰研究

• 徐國琦

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關係問題在中外學術界尚屬乏人問津的領域，一戰期間的華工研究更是亟待突破^①。本文作者近幾年來遍訪歐、美、中國大陸及台灣各大檔案館，力圖全面展示一戰華工問題的全貌，回答諸如中國派出華工動機，以及英法兩國尋求華工幫助的背景及其對華工態度、管理方法等在中外學界尚屬研究薄弱環節之課題。

一 一戰華工問題的緣起

研究一戰華工問題，首先必須回答中國為甚麼要派出工人。學術界對此問題一直誤解甚深。普遍的看法是招募華工純是列強之意，積貧積弱、外交被動的北京政府無能抵抗協約諸國剝削中國人工資源，只得屈從^②。此一見解顯然是對中國與一戰關聯問題缺乏深入研究所致。本文限於篇幅，無力全面展開對中國與一戰關聯問題的論證，在這裏僅撮要指出，中國在一戰期間固然積貧積弱，但矢志變革、立意維新是自甲午戰爭以來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巨大潛流。此一發不可擋的洪流沖垮了主宰中國長達二千餘年的王朝體系，並在中國建立了亞洲第一個主要共和國。壟斷中國意識形態的儒教也在這股洪流的衝擊下黯然退出歷史舞台。銳意進取、奮發圖強、充滿世界眼光及前瞻意識的一代新人，取代汲汲於「聖賢之書」的舉人、進士，成為新社會的主導力量。以陳獨秀、顧維鈞、王寵惠、陳錦濤等為代表的社會精英，立志要一掃中國落後、貧弱之形象，推動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並尋求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認同形象。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積極主動、充滿創新意識的新中國外交出籠問世。

就在中國處於新舊交替、變革維新的氣氛下，由西方主宰的國際體系也正面臨巨大挑戰。德國、美國及日本正以各自的方式挑戰現存的世界秩序，並力圖創造對其有利的新世界體系。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在這種新舊力量不斷衝突下爆發。這一史無前例的「大戰爭」為中國進入國際社會及開展積極外交提供了

中國在一戰期間固然積貧積弱，但在中國建立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銳意進取、充滿世界眼光及前瞻意識的一代新人，成為新社會的主導力量。他們立志要一掃中國落後之形象，推動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並尋求建立全新的國家認同形象。

* 本課題是海華基金會資助項目，在此謹向該基金會慷慨支持表示謝意。

有利的國際舞台。正是這種東西方的因緣際會，導致近代中國首次有計劃、有策略、有準備的主動參與國際事務之舉，並在1914年夏秋及1915年兩度主動尋求加入世界大戰，意欲乘此收復山東，進而收復自鴉片戰爭以來不斷喪失的國家主權，一躍成為國際大家庭中平等、受各國尊敬的一員。遺憾的是，力圖乘機成為東亞霸主的日本，竭力阻撓中國的參戰計劃及復興圖謀。日本的反對導致中國的參戰謀略胎死腹中，未能付諸實施。

參戰受阻雖然使中國加入國際社會的大戰略一時受挫，但中國的雄心並未因此消沉。特別是在日本於1915年初向中國提出臭名昭著的「21條」後，中國參與國際社會、參與一戰的決心更為堅定、迫切。因為中國知道，倘不如此，中國只能成為日本的附屬國，遑論成為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及收復國家主權。主導中國外交的新一代政治家思考新的謀略來阻止日本陰謀得逞，並幫助中國同協約國事業密切相聯，以實現中國參與國際社會及成為平等一員的外交大戰略。向協約國派出華工就是在這種氛圍中脫籠而出。用首先提出此一計劃的梁士詒的話說，這是中國的「以工代兵」戰略^③。

在進入主題以前，有必要介紹梁士詒其人。梁士詒，廣東人，一生身居要職。一戰期間，他作為袁世凱總統心腹，參與各種機密決策，在政壇縱橫捭闔，呼風喚雨，有「二總統」之稱。同時手握財權，有「財神」之號^④。梁氏雖善弄權術，但目光遠大，視野開闊、獨到，一些外國觀察家稱其為「中國的馬基雅維里」^⑤。

梁士詒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頗為關注，並研究一戰對世界格局及中國命運的影響。早在1914年8月，戰爭烽火在歐洲剛剛燃起之際，梁以其獨到分析，預測一戰對國際格局、中國前途影響深遠，呼籲中國應當機立斷，主動參戰，並預言德國寡不敵眾，決不能久勝，中國因此可加入協約國一方，對德宣戰，此舉一可收復山東，二可幫助中國加入戰後和會，分享國際論壇，參與國際新格局的建設，讓國際社會聽到中國的聲音、中國的追求。概言之，參戰有利中國的長遠發展及大戰略。當一戰進入1915年，梁氏進一步認為協約國必勝，主張中國絕對應把握時機，毅然捲入^⑥。

正是基於以上判斷，梁士詒的「以工代兵」計劃孕育成熟，並在1915年付諸實施。梁和他的得力助手葉公綽在1915年夏首先向英國兜售華工計劃。根據英國駐華公使館武官魯伯遜 (David S. Robertson) 的報告，梁在1915年6月同英國接觸，提議中國向英國派出30萬華工並裝備十萬步槍。這些華工由英國軍官指揮，馳援歐洲戰場。必須指出的是，梁對英國的提議實屬武裝華工。換句話說，如果英國接受梁的計劃，中國在1915年便即軍事介入參戰！

讓梁士詒失望的是，英國對其計劃並不熱心。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 (John Jordan) 稱中國的「以工代兵」策略純屬「天方夜譚」^⑦。英國國防部也認為「利用中國人作戰或作工的提議」「不可行」，因為無論選擇作戰或作工都會導致中國成為協約國一員，從地緣政治上考慮這是「不可取的」。英國因此拒絕梁氏提議^⑧。

英國的冷遇並未使梁士詒放棄他的計劃。他將華工計劃略作修改，轉而同法國接洽。修改後的計劃不再有「武裝華工」字眼，「華工」代替「武裝華工」。同英反應不同的是，法國此時也正在考慮利用華工的想法。梁的計劃同法國的思慮一拍即合。法國立即接受梁的提議，陶履德招工團 (The Truitt Mission) 應運而生。

被外國觀察家稱為「中國的馬基雅維里」的梁士詒，早在1914年8月就呼籲中國應當機立斷，加入協約國一方對德宣戰。梁士詒提出「以工代兵」計劃，並在1915年6月同英國接觸，提議中國向英國派出30萬華工並裝備十萬步槍。這些華工由英國軍官指揮，馳援歐洲戰場。但英國對其計劃並不熱心。

二 法、英在華招工的經過

早在1915年3月，鑒於戰爭進展不利，法國國內人工資源嚴重匱乏，軍方開始考慮尋求外援，使用華工便是方案之一。後因內部分歧，使用華工的動議被擱置^⑨。然而，時至1915年夏，隨着戰爭越來越嚴重，人力資源愈緊，法國軍方再次想到求助中國^⑩。梁士詒的華工提案可謂雪中送炭。

法國駐華公使康悌 (A. R. Conty) 同梁士詒幾經磋商後，於1915年6月9日向法國政府報告中法可以就使用華工問題達成協議。中方前提是華工在「理論上」應受僱法國私營公司，以免德國指責中國違背「中立」條規。同年11月11日，法國國防部門正式決定立即將招募華工計劃付諸實施。1915年12月1日，法國軍方任命退役少校陶履德 (Geoges Trupitel) 為法國國防部代表，組織陶履德招工團立即赴中國招募工人^⑪。團員純是法國軍官及政府僱員，無一來自民間機構^⑫。

為了配合法國在華招募工人的需求及避免予德國任何口實，梁士詒與中國實業銀行行長王克敏設立惠民公司承攬招募華工具體事宜。惠民公司與陶履德招工團幾經談判後於1916年5月14日雙方簽訂合同。

必須指出，陶履德招工團並非法國在華招工的唯一機構。其他部門如法華教育會及格利葉招工團 (The Grillet Mission) 等也相繼插手招募華工事宜，只不過它們不如陶履德招工團影響大、招工多。

首批華工於1916年8月24日抵達法國。法方開始時對招募華工前景頗為樂觀，設想到1917年底可招募十萬華工來法，甚至提出如何分配這十萬華工方案。根據法國國家檔案館的一份文件，這十萬華工的分配方案如下：軍械部：二萬華工；陸軍部：五萬華工；交通部門：三萬華工。法國顯然過度高估了自己的招募能力^⑬。事實是，法國最終招募到的華工遠遠不足十萬人。

法國期望落空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其外交部與國防部門在招募問題上相互扯皮、互不配合。特別是陶履德招工團與法國駐華公使康悌之間的介蒂。康悌從一開始就認為招募工作屬於他的管轄範圍。畢竟他是最先同梁士詒談判華工事宜的人。因此康悌對陸軍部派遣招募團並派自己人管理，心懷不滿，對招募團抱有戒心。他指責陶履德招工團及法國軍方「完全漠視中國環境」，導致工作上錯誤百出。康悌公開聲稱他對此不負責任^⑭。法國軍方也不示弱，反駁康悌的指責「缺乏事實依據」^⑮。

法國陸軍部在招募方法上固然有嚴重缺陷，但招募受阻，外交部也難辭其咎。法國駐華公使館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是其一手造成的天津「老西開事件」。該事件嚴重影響了法國在華北的招募工作。

如前文指出，英國在一開始對尋求華工援助深具戒心，並因此對梁士詒的計劃置若罔聞。英國的心態在朱爾典發回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昭然若揭。朱爾典在評論梁士詒的華工計劃時這樣寫道：「在我看來，中國新一代政治家致力於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平等地位及在戰後擁有發言權。如果這一目標不能保證，他們是不會同意其同胞馳援歐洲戰場的。」^⑯英國作為在中國擁有巨大不平等權利的國家，是不願看到因中國國際地位上升而喪失這些不平等權利的。箇中奧秘可以解釋英國為甚麼一開始就對梁士詒的「以工代兵」計劃予以排斥。

然而，當戰爭延伸到1916年夏季時，英國的處境相當危險。索姆一戰尤其

1915年夏，隨着戰爭越來越嚴重，人力資源愈緊，法國軍方再次想到求助中國，梁士詒的華工提案可謂雪中送炭。法國駐華公使康悌同梁士詒幾經磋商後，於1915年6月9日中法就使用華工問題達成協議。1915年12月，法國軍方任命退役少校陶履德組織招工團，立即赴中國招募工人。首批華工於1916年8月24日抵達法國。

索姆一戰使英國元氣大傷，緩解人力資源的匱乏，成為英國的燃眉之急。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防大臣勞合·喬治同意「在法國及其他戰區」使用華工，並決定考慮招募「四萬至五萬」華工。到1917年4月底，3.5萬中華健兒已被英國送到法國前線。英國當時甚至秘密招募藏人到前線服務。

使英國元氣大傷。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力量來保證英國的生存、緩解人力資源的匱乏，成為英國的燃眉之急。至於如何處理中國的國際地位，大英帝國求助中國人的尊嚴受損等考慮，只好退居次位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英國一改初衷，在1916年夏接受招募華工的提議。國防大臣勞合·喬治 (David Lloyd George) 因此原則上同意「在法國及其他戰區」使用華工，並決定如果華工計劃順利進行的話，英國可考慮招募「四萬至五萬」華工^①。1916年8月14日，英國正式通知法國關於英國遠征軍在法國使用華工的法案^②。

同法國一樣，英國軍方選派自己的代表布恩尼 (Thomas J. Burne) 具體負責招募華工事宜。布恩尼的正式頭銜是「陸軍部為英國在法遠征軍在華北招募華工代表」，其招募基地在山東威海衛。必須指出，威海衛並非英國軍方的首選。陸軍最先考慮在香港招募華工。此計劃報知朱爾典後，遭後者反對。朱爾典認為中國南方人不如北方人身強力壯。軍方最終同意朱爾典的分析，改選威海衛作招募基地^③。

和法國相比，英國的華工招募合同頗為苛刻，英國對此合同甚為滿意。但英方的招募工作並非一帆風順，初期頗教人失望。到1916年底，招募尚不足40人。但很快走上正軌。到1917年4月底，3.5萬中華健兒已被英國送到法國前線。根據法國駐倫敦法軍武官的一份絕密報告，英國當時甚至秘密招募藏人到前線服務。

同法國相比，英國招募華工明顯比較成功。主要原因在於英國外交部與國防部在招募華工問題上配合得比法方好，不像法方互扯後腿。

由於運輸噸位嚴重欠缺，英法在1918年初相繼決定停止招募華工。法國從1918年2月10日正式決定停止招募華工。英國在兩個月後亦步法國後塵，於1918年4月14日作出同樣決定。英法兩國的華工招募工作到此告一段落。

三 華工數字問題

究竟有多少中華健兒在一戰期間受英法之召到法國為協約國效力，迄今仍無確切答案。涉及華工的各種數字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例如，海外前幾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辭典》援引的英國招募一戰華工數字為32萬人^④。英國學者瓊思 (A. Philip Jones) 則認為一戰期間英國在法國、美索不達米亞等地所有華工加起來只有15萬人^⑤。美國國務卿蘭辛 (Robert Lansing) 在巴黎和會上提及中國為協約國提供了「20萬人力」^⑥。中國學者陳三井支持蘭辛的說法，持20萬之說^⑦。在戰時直接參與華工工作擔任翻譯的顧杏卿則聲稱英法兩國在一戰期間共招募了約17.5萬華工^⑧。

不同數字之間的差異呼喚學術界深入研究華工課題，解決此疑案。顯然數字問題頗為複雜難解。這一問題從華工招募初期就存在。英法兩國不同的招募方式，缺乏中心協調管理機構，多部門插手及管理紊亂等導致統計數字的出入。1917年，北京政府為解決中心管理問題成立國務院僑工事務局，並設立僑工事務局員。但此舉對於解決統計數字的問題收效不大。僑工事務局意識到數字問題的重要性，曾委派在法國專門管理華工事務的僑工事務局員李駿加以調查。但從李駿的多份華工事務局報告看來，其在提供確切數字問題上似乎也愛莫能助^⑨。

本文不敢奢想能夠提供準確華工數字(恐怕無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但本文可以利用接觸到的各國檔案資料,鑒別各種數字,去偽存真,得出比較可靠的大概數字。讓我們首先來解決法國招募華工的數目。在法國國家檔案館、外交檔案館、陸軍部檔案館(包括海軍)均藏有相當數量的華工資料,並提供了相關華工數字。問題是如何鑒定數字的可靠性。

法國陸軍在署期為1919年9月25日的一份文件中明確指出36,936名華工在一戰期間被招募到法國。該報告甚至分別提供了1916-19年法國招募之華工抵達法國的年度數字。根據此一份報告,1916年度5,979位華工受法國召喚來到法國。1917年度18,117人;1918年度為12,839人;1919年仍有四位華工抵達法國^⑥。該報告的數字同中國政府的數字頗為接近。據北京政府署期為1919年4月的一份報告,法國截至1918年10月29日共招募36,965位華工到法國^⑦。然而,這是否代表為法國所僱華工的全部人數呢?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第一,中法雙方提供的數字只包括實際抵達法國的華工,可能並不包括赴法途中受德潛艇攻擊等原因死亡的華工。第二,上述數字似乎只包括法國軍方即陶履德招工團招募來法的華工數字,至於其他機構如法華教育會等招募的華工似乎並不包括在內。第三,甚至陶履德招工團或惠民公司招募的數字似乎也存可疑之處,因為上述法方數字同其他資料並不完全吻合。例如,法國駐華公使館臨時代辦戴馬德(De Martel)早在1918年2月18日致法國外交部的一份報告中即承認惠民公司至此已招募35,000人^⑧。更重要的是,法國駐華公使波普(Boppe)在1919年10月22日的報告中確認惠民公司共為法國招募華工40,429人^⑨。因此,要解釋究竟哪一個數字更為準確,我們需要進一步加以鑒別。

筆者認為,波普的數字更為可靠。根據如下:第一,波普的數字是在為解決惠民公司就法國單方面終止合同要求賠償損失引起爭端的情況下精心調查所得的結果,可信度較高。第二,波普的數字比上引軍方數字更晚一些出現,因此可能更接近實際的數字。第三,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分析,其實波普的數字與國防部的數字之間並無多大出入。前者是惠氏公司實際招募的人數,後者也許為實際抵達法國者。

前文指出,除陶履德招工團外,法國其他一些機構也插手在華招工。究竟多少華工因此來到法國,目前尚無確切資料。但根據筆者的估計,其數字應超過兩千,低於一萬^⑩。如果這一判斷正確,我們至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一戰期間,大約有四至五萬華工在法國的召喚下來到法國,為法國的勝利作出寶貴貢獻。

現在讓我們審察英國在一戰期間所招華工人數。根據英國國防部的一份文件,在1917年1月18日到1918年3月2日期間,英國共輸送94,458名華工到法國前線服務^⑪。鑒於此一數字不包括1917年1月18日之前和1918年3月2日之後英國所送華工數字,我們有理由相信實際數字比該數目更大一些。例如,1919年12月10日,在回答國會議員威廉斯(Aneurin Williams)的質詢時,國防大臣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答稱在一戰期間約有十萬華工在法國前線效力^⑫。中國政府提供的數字稍有出入,聲稱一戰期間英國在華共招募11萬人^⑬。也許這兩個數字之間並無矛盾。因為並非所有英國招募的華工都來到法國,有些可能被送往其他戰場。

根據以上材料,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一戰期間共有約十萬華工為英國在法國前線流血犧牲。英法兩國在法國的華工加起來應在14-15萬之間。

究竟有多少中華健兒在一戰期間到法國為協約國效力,迄今仍無確切答案。各種數字,莫衷一是。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辭典》中一戰華工數字為32萬人,美國國務卿蘭辛在巴黎和會上提及「20萬人力」的華工。現據英國國防部的一份文件,在1917年1月到1918年3月期間,英國共輸送94,458名華工到法國前線。英法兩國在法國的華工加起來應在14-15萬之間。

四 華工的管理問題

如前文指出，英法兩國招募華工旨在為其戰爭服務，兩國均屬意中國北方人，特別是山東人。華工來到法國後，過的是軍營式生活，在英國管理下的華工尤其如此。他們如果嚴重違規違法，會受軍事法庭制裁。在一戰期間，至少有十名英國治下的華工遭軍事法庭處決^㉔。兩國對待華工的態度及管理方法也有差異。整體說來，法國管理下的華工待遇較好，工資較高，行動也比較自由。英國當局對此直認不諱。英國將軍福德 (R. Ford) 在其一份秘密報告中寫道，英法兩國在管理華工上存在巨大差異，其中「最突出的差異在於英國不准中國苦力進入各種咖啡館，但法國則沒有此限制」^㉕。英國軍方甚至抱怨法國人對華工態度太友好和善，並因此給英國帶來「嚴格管理華工的巨大困難」^㉖。英國軍方對其管轄的華工受到比法國華工更多約束及更嚴格限制頗為自得，並建議法國仿效^㉗。

一些不滿英國粗暴管理的華工有時私自跑到法國華工營工作。筆者發現的英國一份文件這樣寫道：「〔華工〕54857號自1919年3月到同年5月〔未經允許〕跑到法方9號華工營。苦力68211號在失蹤六個多月期間，曾在好幾個法方華工營待過。149號華工營的兩個苦力不久前因逃跑而被捕。他們供認曾在里特 (Litte) 附近的法國華工營生活一陣。」^㉘為了防止華工逃跑到法方華工營，英國軍方要求法國老百姓不要同華工交往。英國司令部在給法方的一份備忘錄中「最強烈的敦促」法方阻止法國人民同華工的交往及聯繫，聲稱這一點「極其重要」^㉙。

針對華工逃跑等系列問題，英方不思改進管理方式，反而變本加厲，採納更為嚴格的條規。例如，1919年中旬英國軍方制訂了下列管理華工的新條例，其主要內容如下^㉚：

- (1) 華工每日收工後要驗交通行證 (pass)，並簽字。負責工頭需要同時驗交寫有營隊番號的集體通行證。華工晚間收工後不准離開駐地。
- (2) 管理部門將經常舉行突擊查房方式，檢查是否有人私自離隊或有其他不法行徑。
- (3) 營地軍警有責任報告及登記任何造訪華工營的營外華工。
- (4) 工頭應對華工的行為負責。對有意遲到、早退或誤工的華工應嚴懲。
- (5) 華工不准擁有平民制服。

此類視華工如囚犯的條規出籠，充分反映了英國管理華工的方式存在嚴重問題。華工固然有許多不是之處，甚至違法亂紀，但主要根源在於雙方在文化、風俗及語言上存在巨大鴻溝。翻譯人手欠缺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許多誤解的產生是因為雙方無法溝通和缺乏相互理解，結果造成華工逃跑甚至犯法等悲劇。

英軍格雷上校 (C. D. Gray) 是分管華工營的一位軍官，對管理問題深有體會。他在1918年初的一份保密函件中寫道，華工營管理工作出現的許多問題，責任不在華工而在軍官。他認為許多管理華工營的英國軍官根本就不稱職。他們不懂如何管理華工，也不知如何處理因語言溝通或誤解產生的問題，只知一味採取高壓或彈壓。結果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進一步惡化。格雷抱怨說，任何一點糾紛出現後，軍官經常不分青紅皂白，在未弄清楚華工問題之

英法兩國招募華工均屬意中國北方人，特別是山東人。而法國管理下的華工待遇較好，工資較高，行動也比較自由。英國將軍福德在一份秘密報告中寫道，英法兩國在管理華工上「最突出的差異在於英國不准中國苦力進入各種咖啡館，但法國則沒有此限制」。英國司令部在給法方的一份備忘錄中「最強烈的敦促」法方阻止法國人民同華工的交往及聯繫。

前，便開槍彈壓。格雷指出，許多軍官因為不了解華工，便對他們嚴加防範，經常訴諸嚴厲措施，並限制華工自由。他在該函的最後寫道，華工如管理得法，工作會十分出色，但英國的管理方法，亟需改進^④。

其實，管理方法是與管理態度密切相聯的。英國之所以採取粗暴嚴厲的管理措施來對付華工，往往是他們強烈的種族主義情結作怪。在英國人心裏，華工只不過是低人一等的苦力，是不成熟的兒童。出於這一心理，他們對華工棍棒相加，要求華工「尊重及服從」，同時並不傾聽華工的需求。一位負責華工事務的軍官富頓上校 (R. I. Furdon) 在對華工的訓話中就明顯流露出這一心理^⑤。在戰時來到法國資助華工的蔣廷黻 (1895-1965) 對英國人的種族主義態度有深刻觀察，他後來寫道：「在我看來，華工在法國管理下比較滿足。除管理方法差異外，一個重要因素是軍官對華工的態度。法國人〔對華工〕較少種族歧視，態度也較民主，對〔華工〕感受比較關切。」英國人則相反，他們「總是刻意維護其軍官及白人的尊嚴及優越感」^⑥。

也許最能反映英人對華工的種族歧視態度是當事人所寫的一首詩，作者克蘭 (Daryl Klein) 是英國華工營的軍官。此人的戰時日記保存下來。這首詩就是記錄在他的日記裏，題目叫《幸福的華工》，內容如下^⑦：

其在中國出生，
一生孤獨、淒涼、生活艱辛。
……
偉大的白人突然降臨，
為其空白的人生找到指路的星辰，
幫其負笈海外，
躋身十萬華工其中。
在戰火紛飛的法蘭西尋找新的生命及命運……

顯然，在這首詩的作者看來，華工並非來拯救英國，而是受白人開化啟蒙的。

五 華工之貢獻

耶魯大學歷史學家肯尼迪 (Paul Kennedy) 曾寫道，美國對一戰的貢獻是經濟上而非軍事上的。美國參戰並未在軍事上立即產生影響，但美國的加入馬上幫助協約國免於因戰事而「有破產之虞」^⑧。在這裏，我們也可以同樣指出，中國輸送近15萬華工到法國及最終宣戰，也許對協約國在軍事上沒有直接的貢獻，但意義重大。古老的東方文明主動參與拯救西方文明於水火，不僅為協約國提供了道義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有源源不斷的中國人力資源支援，協約國可免於人力破產之憂。顯然，充足的人力資源是打贏現代戰爭的重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全方位的現代戰爭，戰爭取勝與否，不僅取決於戰場上的一決雌雄，更重要的是取決於經濟後盾及人力資源。誠如倫敦《泰晤士報》所評，「現代戰爭是一種現代工業」，華工是這種新戰爭的「一支新部隊，他們的武器是鐵鎬、撬棒、鏟鏵及推車」^⑨。

英國之所以採取粗暴嚴厲的管理措施來對付華工，往往是他們強烈的種族主義情結作怪。在戰時來到法國資助華工的蔣廷黻有深刻觀察，他寫道：「法國人〔對華工〕較少種族歧視，態度也較民主，對〔華工〕感受比較關切。」英國人則相反，他們「總是刻意維護其軍官及白人的尊嚴及優越感」。

華工年齡在20-40歲之間，個個身強力壯，能吃苦耐勞。他們一天工作十小時，一周七天，極少休息。華工的到來至少可以幫助相同數目的英法青年走上前線，直接參戰。從這一角度分析，15萬華工等於15萬部隊，儘管他們不能享受工兵的待遇。

華工出色的工作贏得英法雙方高度讚揚。協約國聯軍總司令法國元帥福熙(Ferdinand Foch)稱讚華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們在現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艱難，保質保量的完成各種任務」^{④7}。法國一位具體負責華工營的軍官在向其上司匯報時寫道，華工「溫和、聰慧，是優秀的工人」^{④8}。在英國管轄下的華工，儘管面臨各種管理問題及種族歧視，也表現優異。英國人威克夫德(H. R. Wakefield)當時所寫的華工報告就是華工出色工作的最好見證。他這樣寫道，每一位華工都是「頂呱呱的多面手，能忍不能忍之苦，工作風雨無阻，冷熱不懼」。「他們善於學習，對英國遠征軍的各種工作需求，都能應付自如。」^{④9}英國國防部對華工的出色工作也深為讚賞，稱他們是所有工人中「最好的」^{⑤0}。

由於大多數華工的工作地點靠近前線，不少人因此血灑而願，甚至為協約國捐軀。迄今為止，歷史學家尚不能確定究竟有多少華工為協約國事業獻身，本文在這裏只能嘗試解決這一問題。華工死亡的數字包括三個方面：(1) 在赴法途中死於德國潛艇攻擊。(2) 戰爭期間死於戰場。(3) 戰後為打掃清理戰場，死於地雷、引爆炸彈等。

有關赴歐途中死於德國潛艇攻擊的華工，有案可查的是752人^{⑤1}。至於多少人死於戰爭期間或戰後清理戰場中，需要加以論證。筆者尚未發現任何資料直接回答該問題，但我們可以間接求證。一個辦法是調查在法國的華工墓地。在法國有多處一戰華工墓地。在一個名叫「諾愛爾」(Noyelles，靠近索姆灣)的華工墓地，800餘華工埋骨於此。在另一個離巴黎不遠的巴倫(Boulogne)墓地，有1,000餘華工的英靈永存於斯。在巴納克(Les Baraques)村莊墓地，201位華工埋葬在這裏。把死於途中及葬身於法國的華工數字相加，我們可以得出近3,000名華工死亡的數字。

第二個辦法是文字資料。1919年12月10日英國國會記錄記載約2,000名英國管理的華工在一戰期間死亡^{⑤2}，這一數字同我們統計墓地的數字相近。但回答數字的重要性在於，如果其屬實的話，我們可以確信實際死亡的數字更大一些，因為這2,000人僅包括英國華工，法國華工並不包括在內。我們有理由相信，應有一些法國華工死於戰場的。還須指出，在一戰期間，尚有中國水手服役於英國船艇。根據中國駐倫敦大使的報告，他們之中有448人直接死於戰爭行動^{⑤3}。中國駐倫敦總領事的報告則認為863名效力英國的中國水手死亡^{⑤4}。

至此，我們可以初步得出結論，一戰華工中有3,000-4,000人(包括水手)死於協約國事業。死亡率達2%以上。

令人遺憾的是，華工的流血犧牲、華工對一戰的貢獻並未得到肯定。在巴黎和會上，英國外交大臣巴爾福(Arthur Balfour)指責中國對一戰毫無貢獻，為戰爭「未花一先令，未死一個人」^{⑤5}。他顯然無視華工的貢獻，無視華工血染歐洲的事實。

更令人冷齒的是，英法在戰後把華工視為「妨礙地方安定」的替罪羊，迅速

15萬華工出色的工作贏得英法雙方高度讚揚。迄今為止尚不能確定究竟有多少華工為協約國捐軀。但在巴黎和會上，英國外交大臣指責中國為戰爭「未花一先令，未死一個人」，顯然無視華工血染歐洲的事實。更令人冷齒的是，英法在戰後把華工視為「妨礙地方安定」的替罪羊，迅速把他們遣送回國。我們的結論是一戰華工中有3,000-4,000人死於協約國事業。

把他們遣送回國。英國在1919年秋開始遣散華工，翌年4月6日完成。法國的遣送工作也在1922年3月結束^⑥。尤有甚此，英國人拉魔特 (Ellen N. La Motte) 甚至聲稱華工對協約國有害無利，因為是華工為歐洲帶來「西班牙流感」(The Spanish Flu) ^⑦。

註釋

①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三井的《華工與歐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52號(1986)，是目前一戰華工研究的唯一權威論著。

② A. Philip Jones, *Britain's Search for Chinese Coopera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6).

③④⑥ 鳳岡及門弟子編：《民國梁燕孫士詒先生年譜》，第一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310；197；194-96。

⑤⑧ Michael B. Summerskill, *China on the Western Front* (London: The Author, 1982), 30; 82.

⑦ Jordan to Grey, 25 July 1916,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hereafter cited as PRO, WO/106/35.

⑧ "Summary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Recruiting of 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12 January 1917, PRO, WO/106/33.

⑨ Le Major Général to Monsieu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Etat-Major de l'Armée—1^{er} Bureau,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 Château de Vincennes (hereafter cited as Vincennes), 7N398/Chine.

⑩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à Monsieur le Général Commandant en Chef (G. O. G.—1^{er} Bureau), Paris, 27 October 1915, Vincennes, 7N4355/Main-d'Oervier Indigence.

⑪ "French Foreign Ministry Report on Chinese Laborers", 23 January 1917, Quai d'Orsay,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1918-1929, vol. 41.

⑫ "Note pour l'Etat-Major de l'Armée from Le Général Directeur des Troupes Coloniales", 4 October 1917, Vincennes, 6N149/Fonds Clemenceau/Mission de Recruitment des Ouvriers Chinois.

⑬ Archive Nationale, Paris, F14/11331/Chinois/Institution et Affaires General, 1917.

⑭ Quai d'Orsay Report on Chinese Workers, 23 January 1917, Quai d'Orsay,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1918-1929, *Chine*, vol. 41; Conty to Quai d'Orsay, 12 February 1917, Quai d'Orsay,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1918-1929, *Chine*, 41:163.

⑮ Quai d'Orsay,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1918-1929, *Chine*, 41/166-167.

⑯ Jordan to Grey, 25 July 1916, PRO, WO/106/35.

⑰ War Office Document, 45, August 1916, PRO, WO/32/113.

⑱ War Office Memorandum, 45, 14 August 14 1916, PRO, WO/32/113.

⑲ War Office Document, 12 January 1917, PRO, WO/106/33.

⑳ Stephen Pope and Elizabeth-Anne Wheal, eds., *Dictiona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㉑ 同註②書，頁108-109。

㉒ "Council of Ten", 15 January 1919, FRUS,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1919), III, 567.

㉓⑥ 同註①書，頁34-35；72。

㉔ 顧杏卿：《歐戰工作回憶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50。

㉕ 李駿的系列報告〈調查在法華工情形書〉在1919年5、7、8、10、11、12月的《新中國》雜誌第1卷第1、3、4、6、7、8期發表。

- ⑳ Report from Chef du Service des Travailleurs Coloniaux to Ministre de la Marine, 25 September 1919, Marine, SSEB 7/Main d'oeuvre demandes statistique.
- ㉑ 〈國務院僑工事務局第五次調查在法華工情形書〉·《新中國》·第1卷第3期(1919年7月)·頁261。
- ㉒ Martel to Quai d'Orsay, 18 February 1918, Quai d'Orsay, *Asie, 1918-1929, Chine*, vol. 42.
- ㉓ Boppe to Quai d'Orsay, Beijing, 22 October 1918, Vincennes, 5N216/Chine/January-December 1918.
- ㉔ 關於非惠民公司的招工團可參見法國國防部在1922年致美國勞工統計局的一份備忘錄。詳見Ta Chen, *Chinese Migr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 Bulletin of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3), 144, n3.
- ㉕ "Report on Chinese Labor Corps", PRO, WO/32/11345.
- ㉖ PRO, FO/371/3682/154.
- ㉗ 〈僑工事務局答覆戰後在經濟調查會關於僑工調查事項〉·《新中國》·第1卷第6期(1919年10月)·頁237。
- ㉘ "General R. Ford Report", 18 September 1919, PRO, FO/371/3682/144.
- ㉙ "Note from J. B. Wroughton, Headquarters of British Troops in France and Flanders", 17 July 1919, Vincennes, 7N1297/Chinese Evacuation.
- ㉚ War Office Document, 25 May 1917, PRO, FO/370/2906.
- ㉛ The British Troops Headquarters in France and Flanders, 23 October 1919, signed by Burrows, Vincennes, 7N2289/Affaires Britanniques/Travailleurs Chinois.
- ㉜ Headquarters of British Troops in France and Flanders, 4 July 1919, Vincennes, 7N2289/Affaires Britanniques/Travailleurs Chinois.
- ㉝④ "Proclamation by Furdon to All Chinese Laborers Under British Armies in France", Vincennes, 7N1297, 16 June 1919.
- ㉞ Confidential Letter from Colonel C. D. Gray, PRO, FO/371/3178.
- ㉟ 蔣廷黻: "Letter to the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6 October 1922·轉引自Ta Chen, *Chinese Migration*, 147.
- ㊱ Daryl Klein, *With the Chinks*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18), xi.
- ㊲ Paul Kennedy,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no. 1 (Summer 1984): 24.
- ㊳ *Times* (London), 26 December 1917.
- ㊴ General Foch's Secret Report to Prime Minister, 11 August 1917, Vincennes, 16n 2450/GQG/6498.
- ㊵ Gondre Report, Vincennes, 26 May 1918, 18n 107.
- ㊶ Wakefield Report, PRO, WO/106/33.
- ㊷ War Office Report, 31 December 1918, PRO, WO/106/33.
- ㊸ British Parliamentary Meeting Minutes, 10 December 1919, PRO, FO371/3682/154.
- ㊹ 外交部: 〈受駐英公使電〉·1918年12月7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03-36/4-(5)。
- ㊺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050-12。
- ㊻ Balfour to Curzon, May 8, 1919, E. I. Woodward,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ries 1, VI: 565-566.
- ㊼ 並非所有在法華工都被遣送回中國·有部分滯留法國並同法國女子結婚成家。
- ㊽ Ellen N. La Motte, *Peking Dust* (New York: Century Co., 1919), 240.